

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

于安龙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072)

摘要: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使命追求, 而农民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矢志不渝地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有其特定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和政党逻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理论源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理论指引,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从实践逻辑来说,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彰显,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共富基因, 汲取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精神力量, 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文化逻辑。政党逻辑主要表现为,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内蕴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昭示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 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共同富裕; 农民农村;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5)03-0001-11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A logical framework for integrated rural-farmer development

YU Anlong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stands as the core goal and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ith rural vitalization and farmers' well-being constituting pivotal priorities in this pursui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PC has systematically and unwaveringly advanced the caus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regions, guided by a multidimensional logic framework encompassing theoretical, practic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arty-related dimensions. The theoretical logic in the new era centers on grounding efforts in Marxist principles of common prosperity while adapting these tenets through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o align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text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Practically, advancing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reflects the intrinsic essence of socialism, epitomizes a hallmark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serves as a strategic imperative for addressing China's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Culturally, revitaliz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ethos embedd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vides a deep wellspring of spiritual motivation and collective will. Politically, this endeavor embodies the CPC's founding mission, underscores its value-driven commitments to equity and inclusiveness, and showcases its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o orchestrate systemic reform.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mon prosperity; farmers and rural region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收稿日期: 2024-11-23

基金项目: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
(23JDSZK165)

作者简介: 于安龙(1986—), 男, 山东日照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农村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坚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共同富

裕,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可以说,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从二者的关系来说,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践行初心使命、提升领导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过程。同时,随着共同富裕的进程不断深入、成效日益卓著,中国共产党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富有生机、更加强大的执政党。所以,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和互动关系。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农民农村是重点所在,能否顺利实现共同富裕,取决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展和成效如何。

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研究成果与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等紧密结合,使关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展、研究维度愈益多元。如有学者认为,在新发展阶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1]。有学者认为长期乡村制度供给滞后是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并据此提出要健全以生产者为导向的农业支持保障制度,完善以提升发展能力为核心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等^[2]。有学者从数字经济的重要作用出发,认为其能成为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新引擎^[3]。还有学者从现实角度出发,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制约因素和实现路径^[4],以及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如我国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层面仍面临社会身份转变难、生存条件改善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难等城乡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等^[5]。要言之,当前学术界研究成果多聚焦于“怎么办”,即如何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分析和探讨了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具体举措和现实路径。与之相比,本文则主要聚焦于“为什么”,即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原因和理据何在,并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和政党逻辑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论析,这也是本文的主要新意之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和政党逻辑构成了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要逻辑理路,但并非全部,其他方面还包括历史逻辑、价值逻辑等。这四个方面的逻辑理路之间内在一

体、有机融通,是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根本逻辑依据和支撑。同时,它们之间并非扞格不入、相互割裂,而是彼此支撑、相互依托,构成了一个存在着密切关联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理论逻辑为“根”,实践逻辑为“本”,文化逻辑为“魂”,政党逻辑为“基”,它们是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逻辑理路中的“四梁八柱”,不可或缺而又辅车相依。也就是说,对于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既要着眼不同层面逻辑的针对性、侧重性,又要注重它们之间的整体性、一致性,全面把握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为什么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如何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无论是西方式现代化还是苏联式现代化,其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都遭受了一定的挫折甚至是失败,或者其发展旨向严重背离了共同富裕导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根本上忽略农民、轻视农村,在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失误。这也表明,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理念指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

(一)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昭示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追求,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深刻剖析了在阶级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分化,科学回答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明确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通过压榨工人,掠夺工人的剩余价值,攫取和积聚了巨额社会财富;而广大工人则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日益陷入贫困潦倒之中,从而导致其与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大。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越是不断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归根到底是因为,工人只是资本家攫取利润、获得利益的工具,虽然他们是剩余价值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却难以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获得公平机会和平等地位。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

的万贯家财与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因而他们在富裕水平、富裕程度方面也有着巨大差别。一般而言,一切统治和剥削阶级都具有比被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更高的物质福利和富裕水平,这也是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据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条件。唯有如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6]也就是说,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保障劳动权以及实行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有计划地指导和调节社会生产,才能真正消灭剥削和贫富分化,进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满足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要。所以,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时明确指出:“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7]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是以城乡融合发展为逻辑前提和理论预设的。他们深入论析了城乡分离与对立的危害,包括城乡关系恶化以及乡村发展受到压制等。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城乡对立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其本质是城市资产阶级同农民在经济利益层面的矛盾,“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8]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分工,逐步消灭城乡对立、城乡分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真正走向共同富裕。

列宁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并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予以丰富和发展。在列宁看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列宁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来思考和探索共同富裕问题,强调劳动的成果“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这里的“全体劳动者”,自然包括农民群体在内。他认为,要消灭贫困、实现富裕,就必须把人民群众从阶级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工人,全体中农,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9]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在社会全面繁荣的前提下实现全民的根本利益,使全体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10]在这里,列宁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保障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条件和根本基础。不仅如此,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列宁还通过重新考虑工农交换的原则、重新摆设工农关系的位置等方式,大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为农村发展注入了动力。应该说,列宁对共同富裕内在属性、实现路径等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引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共同富裕问题并非绝对的、空泛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即共同富裕问题是与一定的具体国情、具体实际相联系的。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也必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当时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运用科学理论进行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机械地、僵化地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而是在立足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如李大钊在设想未来社会主义时指出,社会主义并非使人尽富或者皆贫,而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11]。但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走向共同富裕首先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是根本的前提条件和社会基础。否则,实现共同富裕无异于异想天开。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实现共同富裕进入了历史性的新阶段。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2]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初步探索。可以看出,在

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共同富裕”的话语生成是以农民为重点群体、以农村为重点场域的。虽然这里共同富裕的对象主要是农民,但作为当时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农民顺利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进而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业合作化既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方式。1955年10月,毛泽东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阐释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他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2]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导向和目标的,是以造福全体人民为价值追求的,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有着根本的不同。当然,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比较优势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以集体经济代替个体经济,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共同富裕是渐进实现、逐步实现的,是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奋斗中实现的。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激发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农民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力量。在其领导下,通过在农村兴修水利、推进农业技术革新、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等方式,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综上,新中国成立后,“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以及路径探索,都是以农民农村为话语指向、价值指向的重要对象。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但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社会发展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尚有差距。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积极探索更加切合实际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举措和路径等。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思考和回答什么是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等问题,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共

同富裕问题的认识。邓小平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和理想状态,社会主义能为共同富裕提供价值导向和制度保障,“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3]这就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的内在属性和鲜明特征。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之一,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基础。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根本途径和首要之务。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方式,邓小平认为应从中国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政策和方略。就当时而言,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这是中国的重要国情。而人口多,人口最多的群体是农民;底子薄,突出表现在农业农村方面;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为此,改革开放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等,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程。此外,坚持先富带动后富,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和方式。所谓“先富带动后富”,既包括东部支援西部,也包括城市反哺农村,从而不断缩小地区、城乡发展差距,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等。“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13]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思想,通过扶贫攻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中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江泽民重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条件,进而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道路。在此过程中,他还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发挥更大作用。”^[14]胡锦涛强调要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

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二者全面、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则为实现农民脱贫、农村富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这一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提出来,而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实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15]在此期间,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提高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改善了农村生存环境,改变了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状况和生活方式,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大幅度地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为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基础。总之,以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思想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发展,不断充实和拓展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体系。

新时代以来,实现共同富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也面临着各种新机遇、新挑战,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新思考、新探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思想,如“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6]等。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布局中;不断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历史性地消灭了绝对贫困现象,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如期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广大农村地区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等。这些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案,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条件下推进共同富裕的卓越智慧,是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理论指南。此外,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支撑和依托,以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不断开辟拓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路径。

三、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并非只是源于价值驱动和道义追求,也有其充分的现实依据和实践逻辑,是建立在对各种现实要素综合考量和统筹把握基础上的。

(一)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彰显

摆脱贫困,消灭贫穷,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人民的夙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身的使命追求和奋斗目标,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不懈探索。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其中,共同富裕作为其基本内涵之一蕴含其中。自此,共同富裕被定位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创新发展。同时,改革开放开辟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明确了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道路。改革开放启动的重要时代背景之一,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贫穷困苦,距离衣食无忧、生活小康尚有一定距离。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作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之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也为其他领域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在此基础上,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出成就。进入新时代后,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深刻总结和回答了新时代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习近平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17]这就进一步厘清了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逻辑关系,赓续和拓新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更加突出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之间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日益深入,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体现

和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阐述、新表达,也赋予了其新内涵、新意蕴。习近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的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但是不均衡、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18]共同富裕是建立在消除绝对贫穷和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其重要目标之一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换言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共同富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坚持不懈地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取得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阶段性战略成果。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发展,广大农民日益走上了更加富裕的道路。

(二)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9]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目标、现代化路径等方面,都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有着显著不同。西方现代化模式以利益至上为价值导向、以弱肉强食为价值规则,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本为中心、以物为本的现代化模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西方现代化模式虽然创造了可观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精神危机、社会危机和治理危机等。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化的成果被少数人所攫取和占有,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受益者、获利者,而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则沦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垫脚石和牺牲品。所以,西方现代化越是发展,贫富分化的差距就越大,“富者愈富”与“贫者愈贫”的对比就越鲜明。与西方现代化造成了大量的“异化”者、失意者、落魄者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现代化成果为价值导向,以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目标。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实践者,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享有者。使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始终

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群体,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期盼者和受益者,“成果共享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20]。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而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与拓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独具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支撑,它不仅体现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更蕴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几十年来,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共同富裕始终作为一项重要的价值目标和核心理念,被置于现代化建设的突出位置。“共同富裕是以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引导现代化战略选择的内在取向,是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义性的必然要求。”^[21]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不断发展的重要支撑。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的发展是以前者为基础的。作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薄弱环节,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展如何,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个大局。所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这样才能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重要基础。为此,必须把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正确处理共建与共享、先富与后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全方位布局,不断健全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取得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丰富实践经验。当前,我们正处于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关口,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22]。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无疑是其中更为紧迫的战略目标和实践指向。

(三) 推进共同富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其

充分的历史逻辑、现实依据和实践基础,而科学研判和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利于更加明确党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在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结构体系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内涵更加丰富,层次不断提升,逐渐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为广泛、更加强烈。而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新期待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把“蛋糕”做大,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在此基础上分好“蛋糕”,实现二者的紧密联系、有机协同,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实际上,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构成了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二者是同等重要、辩证统一的关系。一体推进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题中之义和现实路径。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丰富,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即是说,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发展依然相对滞后;城乡融合发展依然有待提升,很多农民和农村地区没有达到富裕水平,农村地区仍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场^[23]。因此,在继续保持适当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必须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2],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就是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质言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通过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更加有效地消除区域与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大力度地推动不同领域的协调发展,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全面发展、共享发展、高质量发展。也可以说,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而解决发展不

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则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其中的主要着力点则是农业农村。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强调:“现在从整个国家来讲,实现了全面小康,接下来要走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农村就是要推进乡村振兴。”^[24]推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

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并不局限于上述所及,它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进而言之,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乡村振兴为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保障,二者之间是有机统一、相得益彰的。同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都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彼此融通、相互促进,是一个深度互动、有序衔接的整体。而从实践角度来说,它们之间也是相互支撑、相互依托的,对于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而言,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既是发展目标,又是战略举措,更是实现路径,它们有机统一于建设农业强国的生动实践中。

四、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文化逻辑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的美好向往和本质追求,贯穿于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历程中。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以及赓续绵延的民族精神等,既是一种特有而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文化基础、文化逻辑。

(一)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共富基因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萌芽和精神基因,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积淀、绵延的文明底蕴。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民本思想、民生思想、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等,积淀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要素。如“天道均平”“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与天下人同利”“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等思想理念的提出,既彰显了社会安定、分配公平的重要性,也展现着古人先贤对于分配公正、共同富裕的美好憧憬。这些传统思想理念凝结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和生存发展的智慧结晶,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以农耕文化为主体,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它们凝聚着广大农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丰富经验和独特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实现共同富裕要充分传承、挖掘和利用好农耕文化资源,充分汲取农耕文明蕴含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智慧。此外,无论是洪秀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共富模式,康有为倡导的“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人人即多私产,亦当分之于公产焉”的平等富足理想,还是孙中山阐发的“三民主义”共富方案,实际上都赓续着中华民族朴素的富民兴邦、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都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农耕文化中的均平思想、共富基因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16]这些蕴含着“和谐”“仁爱”“共生”“均等”等价值观念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财富和文化资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文化土壤和思想滋养。

除上述民本思想、政治理念外,孕育于传统农耕生产实践中的“小康”社会、“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等,也是与共同富裕契合度、关联度较高的文化要素。尤其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追求,不仅描绘了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而且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向和思想启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25]总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充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共同富裕的基因,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深厚的文化底蕴、强大的文化力量,同时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焕发出更鲜活的生命力。

(二) 汲取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精神力量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的美好夙愿,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但实现共同富裕并非易事,截至目前,人类历史上尚没有一种实现共同富裕的成熟模式。这是因为作为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共同富裕的实现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坚实的物质基础等,更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甚至可以说,是否具有强大精神力量,是决定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尤其是面对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各种艰难险阻、风险考验等,强大精神力量能够为人们攻坚克难、战胜险阻而发挥出导向、凝聚、塑造、激励等重要功能,从而极大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包括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在内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历史传承的积淀和结晶。作为中华民族生命肌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召唤力和推动力,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内在精神支柱,自然也是支撑和引领实现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精神源泉。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26]尤其是伟大民族精神中蕴含的勤劳、朴实、乐观、不屈等具有鲜明农耕色彩的精神品质,反映了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特有品质和精神风貌,是几千年来支撑和激励广大农民群众追求殷实富裕生活的强大精神动力。可以说,坚持继承和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使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有了坚实的精神基座和充沛的精神动能。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民族精神的忠实传承者、坚定弘扬者,也是伟大民族精神的拓新者、培育者。伟大民族精神只有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继承、发展和创新,才能更富生机、更有活力。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条件和历史任务的发展变化,在传承和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的过程

中,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培育和建构起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深厚的精神底蕴和更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实践基础上,对伟大民族精神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对伟大民族精神的新凝结、新升华、新呈现,精神谱系中每一种伟大精神都是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凝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蕴含的迎难而上、敢于斗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等精神要素,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又蕴含着实现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精神因子。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政治财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依托、精神支柱,能够为实现共同富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其中,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和依靠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凝结和形成了一些特有的伟大精神形态,如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小岗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充分展现了广大农民群众强大的战斗力和创造力,“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16]这些伟大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充实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而且以其独特的生成基础、精神蕴涵、实践指向等,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动力、注入了新能量。

五、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党逻辑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共同奋斗,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领导者、组织者、协调者,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既缘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也系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党属性、政党特质等,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和协调等重要作用的发挥,能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方向指引、注入强大动力。而作为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的“三农”情怀,始终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方针政策,把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民致富放在重要位置,为实现农民

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强领导和政策支持。

(一)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内蕴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实现共同富裕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能否重视和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衡量一个政党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内在地要求把推进共同富裕作为实现和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27]同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民同心、为民谋利的政党,始终把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重要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如果人民群众长期难以摆脱贫困,或者贫富差距拉大,那么就背离了党的性质宗旨、违反了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为己任,并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百余年来,从原来的生灵涂炭、积贫积弱,到当今的小康有余、百姓富足,这一历史性的发展变化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的矢志不移、接续奋斗。相对而言,受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所面临的困难更多,农村全面振兴、蓬勃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更大。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农民农村,反而反复强调农民“一个都不能少”,农村“不能掉队”等,使共同富裕始终以农民农村为重要覆盖范围和对象,从而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政治追求和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共同富裕既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因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财富水平的不同,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等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不断发展、动态演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是根据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主要任务的不同,不断创新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路径方式等,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完善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制度体系,从而不断丰富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拓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道路。具体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从开创农业现代化道路,到城乡联动发展,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从

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国共产党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探索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和方式。这些探索都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过程中前后相继、有序衔接的重要阶段,都是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牢记亿万农民对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巨大贡献,把乡村建设好,让亿万农民有更多获得感。”^[28]所以,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掌权的重要目标,这是由其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所内在驱动的。

(二)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昭示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衡量一个政党性质和宗旨的重要分水岭。坚持人民立场,坚定不移地为人民谋利益、增福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追求,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所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动力。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和执政理念。“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17]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不仅会极大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违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衷和目的。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

带领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从而不断巩固执政根基、维护执政安全,是现代社会执政党的基本职能之一。但在这个过程中,是坚持少数人富裕,还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坚持部分人获益,还是全体人民普遍获益,深刻体现着不同政党的性质宗旨,反映着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属性特征。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所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然,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是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治理难题。不可否认,现阶段农民群体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农民同步富裕、农村同步发展,“必须让亿万农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赶上来”^[28]。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把实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重要位置,始终把共享共富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导向,实现共同富裕深刻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理想和价值追求。

(三)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一种美好企盼,也是一种价值追求,但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因时代条件、现实基础等不同,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和难易程度等也有所差异。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实现共同富裕,其任务之艰、挑战之大、困难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但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16]。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来系统谋划、统筹协调,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组织力,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坚强引领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无论是奠定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开辟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还是制定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政策等,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当前,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重大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引和坚强领导下取得的,这也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最大优势、最大保障。实践表明,实现共同富裕既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神动力,更需要有在此过程中能够发挥统揽全局、系统谋划等重要作用的领导核心,从而可以广泛地凝聚共识、积聚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也是贯穿其执政历程中的一个重大政治战略目标。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和强大的领导力量。其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农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农村改革

发展的“领头羊”，“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战斗堡垒。”^[28]可以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执政掌权的重心所向，深刻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 [1] 陈健. 新发展阶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12): 54-64.
- [2] 郑淋议, 钱文荣.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制度供给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4(1): 84-93.
- [3] 刘晨光.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经济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J]. 农村经济, 2024(4): 13-25.
- [4] 韩文龙, 唐湘.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14-24.
- [5] 孙惠娜, 张旭, 郭义盟. 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5): 153-161.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3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4]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5]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16]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17]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 [18] 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 人民日报, 2022-03-07(01).
- [1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0] 李琳, 庞国光, 郭东. 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特征事实及障碍因素[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3): 30-42.
- [21] 武晋, 祝云凤. 协同性三次分配: 贫困治理视域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4(4): 76-86.
-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 [23] 李林.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2): 125-136.
- [24]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奋进强国路·总书记这样引领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2-03-01(01).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26]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2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责任编辑: 曾凡盛